

转型

中的 社会

与 文化

ZHUANXINGZHONGSHEHUIYUWENHUA

向春玲 著

民族出版社

转型中的社会与文化

向春玲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社会与文化/向春玲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11

ISBN 7-105-04199-4

I. 转... II. 向...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13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50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社会文化篇

-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2)
- 二、西藏昌都宗教信仰的历史与变迁 (19)
- 三、当今西藏宗教信仰的特点及其与现代化关系初探
..... (61)
- 四、惠州婚姻、家庭、宗教与习俗的变迁 (70)
- 五、韩国的金融危机与爱国精神 (100)
- 六、香港贫富差距面面观 (103)
- 七、从文化视角看两性平等 (108)
- 八、家庭的功能及变迁 (112)
- 九、“大道本体论不可废!”
——访著名文化哲学家司马云杰 (116)
- 十、评《中央与地方:非零和的权力关系(1978~1993)》
..... (123)
- 十一、劳动就业问题和劳动制度 (127)

西部社会发展篇

- 一、缩小东西部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50)
- 二、关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对策思考 (175)
- 三、公平与效率: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演化与变动趋势
..... (180)
- 四、西部大开发要有高起点 (188)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研究篇

- 一、普列汉诺夫社会学思想探源 (192)

二、斯大林社会学思想研究	(202)
三、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 布哈林社会学思想研究	(223)
后记	(245)

社会文化篇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

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① 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1. 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 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古、女娲、伏羲、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

^① [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4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①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①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①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②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③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

^①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版。

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与“东亚资本主义”

60~80年代,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打破了基督教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人们考察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而把眼光投向文化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类型(以前只有基督教资本主义和北美资本主义)。现在,不管是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都不得不考虑儒家资本主义类型这样一个事实。

1. 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

清朝以前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遥遥领先于东亚各国,中国以天子国自居,周边国家皆为臣国,臣国定期地要到中国来朝贡。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的民间也有着一定的交往,在交往中,随着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及语言文字在东亚的传播,儒家文化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及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半岛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早、最大,而且在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中国与朝鲜产生交往可追溯到商末关于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据《史记》记载,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纣王无道,杀戮忠臣,箕子劝而不听,“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不久,周武王伐纣成功,“释箕子之囚”,“于是,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殷道变,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箕子为朝鲜带去了中华古老的文明,朝鲜视箕子为古代理想的君主。中国的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是公元前后,伴随着汉字、汉文而输入的。那时,正值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372年之后,朝鲜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学经典。7世纪后,三国开始派遣贵族子弟赴唐留学。735年,新罗统一三国后,更大量向唐王朝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在朝鲜弘扬儒学的一支生力军,为朝鲜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918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王朝虽崇尚佛学,亦不排斥儒学,在太学国子监所授课程仍以儒学经典为主。高丽还开设科举,设五经博士,此后高丽文官渐渐被儒生所取代。除了官府儒学外,私人讲学之风也很盛行,从而促进了儒学在朝鲜民间的普及。13世纪,高丽末期,中国的朱熹理学传入朝鲜,并排斥佛学成为朝鲜朱子学。在李朝时期,朱子学发展成熟,并成为定于一尊的李朝官方哲学。

(2)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学东渐日本,最早是以朝鲜为媒介而进行的。一般认为,285年百济博士王仁赴日本,贡献《论语》十卷与《千字文》一卷,日本应神天皇之子稚郎子拜王仁为师而学《论语》,这是中国儒学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自应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几百年间,《易》、《诗》、《书》、《礼》、《春秋》等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儒学典籍,通过朝鲜半岛,从东亚大陆逐渐传到日本。7世纪,中

国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日本在607年~892年,二十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这些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大都带回许多中国文物礼品,其中包括儒学典籍。归国后,又多主张把中国思想文化移植日本,从而,日本上层社会一般视中国儒学为统治者必备的一种文化修养。儒学在日本由初传进入了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中两国的禅僧交往,使中国的宋明理学得以传入日本。14、15世纪,日本兴起了讲习宋明理学的热潮,经过日本学者的努力,宋明理学日益成熟化,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宋学学派——朱子学派。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朱子学派发展成为幕府时代极权阶级的意识形态,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并立相存,中国儒学在日本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2. 儒学在东亚传统社会所起的作用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之所以受到他们的欢迎,在于儒家文化推动了两国古代社会的进步。首先,为朝日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治政理论。朝日的古代社会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中国先进的封建统治理论——儒家学说在朝日古代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中,不同程度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朝鲜在李朝时期,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经过改造的中国宋明理学成为两国此时的官方哲学。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学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集团都是如此……对于德川幕府来说,更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

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 19 世纪的明治维新。”^① 其次,在朝鲜和日本,中国儒家的“忠孝”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两个国家把“忠孝”看做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而“仁、礼、义、信、智”只是对二者的补充。“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顺从及其实际行为。没有忠,就无法维持中央等级制,“孝”是指保持家族伦理秩序的伦理体系。具体说,孝是一种尊敬自己父母、祖先的思想,要求任何人都必须尊重上下和长幼的伦理秩序。在朝日两国中,人们对忠孝的理解和重视有所偏废,朝鲜由于在长期专制主义控制下,忠君思想成为人们的压迫工具,因而,强化了家族主义和血缘内部的团结。孝在朝鲜社会发挥了比忠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社会,“家”的概念被扩大了,表现为集团或组织,因此“家庭”中的秩序就不能仅靠孝来维持,所以“家庭”奉行的是“忠”的原则。“忠”在日本比朝鲜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两个国家都体现了家族集团主义色彩。“韩国的集团文化特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以‘孝’为原则的集团文化,它具有较强的内在凝聚力”。而“日本所保持下来的集团文化,主要是把‘效忠’原则进一步扩大为‘家族主义’的集团文化”。^②

3. 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第 85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

②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第 11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

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①

(1) 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②。

(2) 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

① [美]赖肖尔:《日本人》,第2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②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版。

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3)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4)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